

李大钊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及其当代意义

王 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自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明对传统思想的猛烈冲击,面对激烈地反对传统的社会思潮,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未人云亦云,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滋养的他们,思想的根基深埋于民族文化之中,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李大钊的思想观念中充满着爱国主义、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大同主义、中庸主义的传统思想因素,他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他的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有重要启示,他所提出的新文化之路,即“第三文明”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的道路。

关键词:李大钊;爱国;民本;德治;大同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5-0041-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5.007

On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in Li Dazhao's Thought and Their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WANG Ji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with the powerful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traditional ideas, a lot of people began to fiercely oppose Chinese traditions, but the most advanced intellectuals did not follow this trend. They received and were nourish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from an early age, and their thought was rooted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Li Dazhao was one of these intellectuals. Li Dazhao's thought was full of patriotism, humanism, rule of morality, cosmopolitanism and eclecticism. 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raditional ideas. His though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today. The new cultural road, proposed by him, namely "third civilization", is the road that must be adh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Li Dazhao; patriotism; people-orientation; rule of morality; cosmopolitanism

从清末民初一直到五四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西式学堂逐渐兴起,西方文明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他们倡导民主与科学,激烈地反对传统成为当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主

题。但更应该被注意和认识到的是,这一时期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未人云亦云,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滋养,深受传统家庭氛围的影响,思想文化根基深埋于民族思想文

作者简介:王瑾(1990—),女,山西长治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化之中,这样的文化基因成就了独特的生命和精神,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摒弃传统文化的因子,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李大钊的思想当中,并未全盘否认传统思想文化,相反他频频回望民族传统,在他的思想中,处处充满着传统的因素。

一、李大钊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博大精深,千载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曹植在诗中写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国家危机存亡之刻,志士仁人奋不顾身,或以身殉国,或救国于水火,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晏子说:“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国之事功在千秋,害国之人遗臭万年,所以偏安东南的南宋才让更多人不甘。深受传统文化和道德浸润的李大钊在这些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成为督促其成长为革命者的内在动力和基本道德要求,故而他一生劳苦奔波,为此努力奋斗与拼搏。

李大钊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可以说坏到了极处,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让中华民族难有立足之地,偏偏清政府又极端腐败毫无救国之意,这些让他痛苦不堪,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只要一息尚存,断不许以绝望自灭,他毅然将天下之兴亡扛在自己的肩头,为民族兴衰殚精竭虑。他将自己读书的小屋叫做“筑声剑影楼”,他写诗道:“策马玉门关,不为儿女颜。悲歌出易水,壮志出天山。”^{[1]241}以荆轲和高渐离自比,也是借古代豪侠之精神来鼓舞自己,为国家慨然不惧生死。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李大钊毅然地选择背负起历史的使命,将个人利益抛之脑后,踏上这条漫漫求索真理的道路。他说,“国基未固,而制抢攘”,“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心血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

之”^{[2]1},“钊自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226}。在永平府中学肄业后,李大钊本来有三所学校可以选择,一是北洋军医学校,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第三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但他说理财仅仅可致个人之富,这与其个人素来的志愿是相违背的,军医亦非所喜,在国势危迫之时,更应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所以才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可见,李大钊在人生选择、求学、择业上均与他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密切相关,这早已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他的一生都在为扫荡中国社会的疲惫而振臂高呼,他充满热情地激励世人发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最后,他也确实是为了国家而竞走奔波,慨然赴死。他的刚劲风骨,他的献身精神,在今天依然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

(二)深刻的民本主义思想

北宋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民本思想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知识分子“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道德操守;另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统治的需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既可以拥护统治,也可以推翻统治。故而知识分子和统治者都把民众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放在较为关键的位置上。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热爱也集中表现为对大众的深情,救国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李大钊的政治观重点也在于他的民本观。

民国以来,国家满目疮痍,频繁战争致使“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其菑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李大钊耳闻目睹民众的挣扎与困苦,深刻理解人民的艰辛和不易,故而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生活的疾苦,他的《大哀篇》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文章在标题下还特别注明了“哀吾民之所失也”,于是他四处奔波,披荆斩棘,殚

精竭虑,思考救国救民之道路。他反对专制独裁,倡导人民民主。他说:“在吾华,历史最古,历史上遗留之种种权威重压累积于国民之思想者,其力绝厚。”^{[2]229}专制主义在中国的根深蒂固,要想使人民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就必须反对专制主义。反对专制是想民众之想,急民众所急的重要基础,在专制主义的前提下,民众的权益和自由很难实现,故而应该实现人民民主,这是对人民权益和生命的极大尊重。

同时,李大钊肯定人的价值,倡导“听民之自器其才,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2]146},肯定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是则民彝者,可创造历史;历史者,不可以束约民彝”^{[2]154},人民群众才应该是国家和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进一步,李大钊主张发挥人民的力量去救亡国家,内抗专制,外御强敌,“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2]111},“苟吾四亿同胞之心力,稍有活泼之机,创造改造之业,姑且莫论,但能顺应此环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视五洲威震欧亚矣”^{[2]163}。当然,人民的力量不是蛮力和体力,不是要民众用柔弱的身躯去抗击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而是重视国民道德的影响和作用,李大钊始终强调人民道德的重塑和形成,近代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物质生产方式的落后,更是民德之失、民彝之蔽、政治之关,故而要通过人民道德的重塑与形成,通过政德、党德、民德的统一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三)明确的德治主义观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明的统治方法是无为而治,唐太宗垂衣拱手,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就实现了贞观之治,严酷的法律、雄厚的军力的确也可以成为统治成功的要素,但若想要长治久安依旧在于德治,民本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德治。

民国以来,“外敌伺隙,领土削蹙;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工困于市,农叹于野;政俗难革,顽梗未净”^{[2]1}的惨淡局面,是国家的不幸,更是民众的不幸,迫切需要清明的统治,英明的君主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李大钊对此深为痛

心,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德治。他要求统治者能够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推行德治,将法治、德治相结合,这样既有章可循,又很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君主是有德之人,才能上行下效;推行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最终达到“天下无绝难之事,伟大之功业,往往发于一念之激明,寐兴复旦之际,疚心自悔,光明之运,即蕴蓄于斯,此平治修齐之功,所以基于诚正格致之德,惟吾人勿自馁耳”^{[2]96}。

在以德治国的思想指引下,李大钊多次劝诫当政者,“以力服人者,不能服人,况治国乎?”^{[1]95}若是以暴力去制服别人,即使口服,也不会是心服,更何况是治国,民众敢怒不敢言,恐怕就有揭竿而起的时候。而偏偏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袁世凯倒台之后,各派军阀势力斗争进一步加剧,“以力制力”“相争相搏”“自为残噬”的情况广泛存在且愈演愈烈,国家破碎或是官逼民反,反对暴政、专制,反对战争和厮杀,推行以德治国就显得更为重要,既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又可帮他们重拾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四)坚定的共产主义追求

《礼记·礼运》篇中曾描绘过一个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共同富裕、美满和谐的古代乌托邦设想,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无论处于什么利益集团,这个乌托邦始终让中国知识分子向往,这样的“大同”也是统治者推行德治的最终目标。

李大钊作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他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大同理想相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契合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设想,尤其是儒家文化所设定的大同理想。儒家思想期待人的精神世界的永恒

和丰足,可杀生而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出入无碍,内外如一,虽不过分追求物质条件,如颜回一样“一簞食,一瓢饮”亦不改其乐,却也讲“仓廩实而知礼节”,讲物质的富庶是精神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同样如此,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解除劳动者的苦痛,实现人类经济和政治的平等,这是精神和物质的全方位满足。

李大钊的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奔走、奋斗,早在1920年,他就和陈独秀分别在上海、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又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十余省市大力发展党的各级组织。1922年至1924年初,李大钊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他在牺牲前的《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支撑着他。

二、李大钊继承传统思想的当代意义

从1927年李大钊去世至今已有90年的时间了,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回看李大钊的思想,仍可得到很多的启示。爱国、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民本、德治、调和是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天下大同是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的集中表达,我们从李大钊在继承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观念里可以看到关于文明、关于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李大钊的新文化之路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处处充满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基因,这种精神和文化的基因绝

不是固守儒家道德,而是在中华民族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地发挥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特质,同时在当时的文化传播态势下,学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先进文化,贯通东西文明,使中西文化调和相长。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日趋激烈,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迫不得已打开国门,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同西方文明冲突碰撞,受到外来文化强有力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文化冲突,继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已经是不可能的,但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也不可能完全不要传统的灵魂和精神,将中国改造成另一个西方社会。所以如何解决文化间的碰撞,用何种文化来拯救中国和改造国民成为摆在李大钊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李大钊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发展了东方文明,既学习西方文化,不盲目地固守中国旧有文化之根,又不将传统文明完全摒弃不用,肤浅地惟西方文明马首是瞻,将民族文化虚无以待。他将两者进行调和中庸,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之路。

李大钊始终坚信中华文明之独有魅力以及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深入分析东西两种文明的特点之后,他说:“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2]264}所以,他提出了“第三文明”。东方主静的哲学是第一种文明,西方主动的精神是第二种文明,但这两者都不是人类进步的最佳选择,惟“第三文明”乃刚柔适宜之文明,理想向上之文明。

恰恰是在李大钊为如何调和两种文明,实现“第三文明”进行思考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李大钊创造性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调和东西文明、给风雨飘摇的中国以新的出路带来了新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对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专制主义等不

适合社会发展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强调和发觉了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广泛传播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重构了中国新文化,为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找到了出路,体现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高瞻远瞩。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径

今天,距离五四运动已过去将近一百年,但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现状依然与李大钊当年所面对的有诸多相似,同样是处于新旧杂存、新旧分立对抗、矛盾重重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发达国家仍然以各种手段在对我们进行文化输出,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和通讯方式成为渗透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的关键手段。表面上看来,这是文化的输出和交流,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渗透、控制与侵略,甚至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诋毁和企图同化社会主义文化、溶解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不良用心。在全面开放的今天,回归纯粹的中华文明已不可能,也着实不是明智之举,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代价我们已经不能再一次尝试。然后,片面地崇拜西方文明,试图完全西化为倡导“民主与自由”以及契约精神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仅不可能最大限度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将使民族精神陷入沦陷的境地,坚决抵制文化霸权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三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理性借鉴”西方文化,创建“青春中华”^[3]的思想是目前状态下的最佳选择。李大钊的文化观,即其文化调和思想所蕴藏的独特精神品质不仅对过去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仍有丰富的价值。在此指导下,在广泛吸收世界文明之有益成果的前提下,首要的是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信心,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遥遥领先,以其先进性、多样性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是在

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忘记传统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文化,深刻体悟和传承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和世界的认知与感受,不忘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价值观念和奋斗理想等基本文化基因,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取与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化,深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价值,形成文化的持久活力。与此同时,力推中华文明“走出去”,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展创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4]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才是我们发展文化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 张清祥. 李大钊“五四”时期新文化建构的现代性方案[J]. 甘肃社会科学,2004(2):33-36.
- [4]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1).

(责任编辑:夏玉玲)